



以无畏与大义 彰显东方主战场的血性担当

——评电影《东极岛》

□张博瑞



1942年10月1日，中国浙江舟山东极岛海域，一声巨响震碎了海面。

一艘名为“里斯本丸”的日军运输船，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船体迅速倾斜、撕裂，海水汹涌灌入，海浪裹挟着呼喊与挣扎，甚至夹杂着枪声。

岸上的舟山渔民听到呼喊，有人放下渔网，有人推来小船，有人跃入冰冷的海水。即便明知可能被日军枪杀，仍有人伸手去拉那些将被海浪吞没的陌生人。那一刻，他们是用生命去救生命。

渔民们不知救的是谁，也无法预知历史的走向。那一刻，没有政治，没有国别，只有活命的本能与救人的冲动——这是人类最古老的道义。

这段历史长期沉睡在浩瀚档案与地方记忆中，直到舟山作家杨怡芬的小说《海上繁花》、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以及电影《东极岛》相继问世，才一点点被带回公众视野。正因这些作品通过不同媒介形式对这段历史的呈现与挖掘，让我们得以探寻：如何在保留复杂性的同时，使其延展出面向当下与未来的价值？

小说《海上繁花》（2023年出版）是这段记忆的拓荒者，它避开宏大叙事的空泛，转而深入历史肌理——借英国战俘伊恩的挣扎与渔民阿卷的坚守，让冰冷的史实词条长出血肉，用情感为被遗忘的往事塑形。

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2024年上映）则选择了另一条“打捞”记忆的路径：以水下拍摄的沉船残骸、94岁亲历者林阿根的证言、英军战俘后代的感恩独白，以及大量书信与照片，将疑问逐一拨回历史原位。它不在于讲述，而在于举证——像在锈迹斑斑的铁板上重新铆牢每一道被遗忘的缝隙，让人无法否认它曾真实发生。

电影《东极岛》（2025年上映）接过了这段历史的接力棒，试图将其推向更为广阔的公共视野。然而，无论是文字、纪录片，抑或电影，它们都肩负着同样的困境：文艺一旦介入历史叙事，便注定要在史实与戏剧、真实与传播之间反复权衡。每一次取舍都如同天秤上的砝码，天平倾向哪边，决定了观众得到的不仅是怎样的故事，还有怎样的记忆。正因如此，电影《东极岛》的创作者们必须直面一个更为艰巨的问题：如何在艺术化的表达与史实的忠诚之间，寻找一条既有艺术丰盈、又能承载历史重量的叙事路径。

导演管虎深知其难。在故事锚点上，剧组力求还原当年的渔民生活，不仅在东极岛原址重建了20世纪40年代的渔村，还请非遗匠人以传统工艺打造十余艘下海用的木船。片尾纪实短片中，“里斯本丸”幸存者丹尼斯·莫利的女儿动情回忆，父亲临终前叮嘱她要感谢东极岛渔民——在他心中，

他们宛如天使，把人们从地狱带向光明。这无不在提醒观众：83年前的救援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发生。渔民救下的，不只是数百名落难者，还有他们的家庭与命运。

影片完成了几重叙事上的转换：类型化改编，从宏大叙事到平民视角。影片以类型化手法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具体的人与情感。这种叙事张力在人物的一次次突发选择中被推向高潮，勾勒出鲜明的人物成长弧光。阿崧从起初顾全小家、犹豫退缩，到弟弟牺牲后毅然潜入船舱救人，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阿荡由最初的好奇，升华为以自我牺牲来换取岛民生路的选择；吴老大在祖制与良知间挣扎，最终敢于打破旧例；陈先生从贪生怕死到怒闯岗楼，与日本兵殊死相搏；阿花打破“女人不上船”的祖训，为营救战俘率数十条渔船出海迎敌救人；保长李元兴夹在百姓与日军之间，最终觉醒反抗……这些情节虽非全然照录史实，却以更浓烈的戏剧张力传递出信念的重量。换言之，影片并非复述一段往事，而是以艺术虚构赋予其更广阔的精神维度。正是人物的选择，使影片在历史真实、情感真实与戏剧真实之间，找到了一种彼此成就的张力。

影片集结了当前中国电影的一线阵容，视听风格上延续了管虎标志性的粗粍紧凑节奏——海浪、甲板、枪声、密闭船舱的黑暗层层递进形成感官压迫。技术层面，剧组搭建了亚洲最大的恒温水景棚，占地9000平方米，可模拟200种海浪；为精准还原渔民形象，训练演员水下闭气时间最长超过4分钟。团队调用数百艘渔船完成惊涛中的救援长镜头，并实景炸沉了1:1复刻的“里斯本丸”号。影片高潮段落，船体断裂沉没，巨大的虹吸漩涡将残骸与落水者卷入深海，场景惊心动魄。观众仿佛能感受到巨浪扑面，又似置身枪林弹雨间。

1942年的东极岛渔民，面对日军射杀落水者的暴行，“救人”的朴素良知超越了国籍、阵营甚至殖民背景，他们对抗的是施暴的日军，守护的是生命本身。这种善良无关身份，只关乎人性。影片援引了岛上流传的一句话：“海上落难人必救”，聚焦于“救人，回家”这一人类共通价值。管虎曾说，家是中国人心灵的根，《东极岛》希望将这种温暖延伸到全世界。由朱一龙、吴磊饰演的孤儿兄弟阿崧与阿荡，因少年时曾被吴老大救起，他们更懂得生命的重量。当阿荡在海上不顾一切救起英军战俘纽曼后，两人因对“家”的眷恋结下跨越国界的友谊。影片中，兄弟二人、吴老大与阿花之间的亲情暗线，与船舱内战俘以故乡歌声抚慰亡灵的场景，共同编织出一张关于“家”的隐秘情感网络。故事的终点，阿崧与阿荡魂归大海，将大海视作最终归宿，更

让“家”的意象从血缘与族群扩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象征。

当然，影片也存在一些争议，如人物转折是否缺乏铺垫、女性角色塑造是否略显单薄等。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下抗战题材电影创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东极岛的故事，在今天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从《海上繁花》的文字叙事，到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电影《东极岛》的影像呈现，文艺创作不断拓展中国在二战叙事中的独特视角。这些作品没有停留于民族伤痛的反刍，而是以平民视角还原历史真相，在苦难叙事中展现中国人的善良与坚韧，彰显中国的大国风范与国际担当。

战争如同一面镜子，既映照出侵略者的残暴，也映照出中国人的大义。《东极岛》为世界留下的精神遗产，不只是英雄主义，

更是面对人类最恶劣暴行时仍能坚守的善良本真。影片中渔民的抉择，是骨子里的善良，是中国人的底色；他们撑起平民之舟，以无畏与大义彰显东方主战场的血性担当。通过将侵略者的罪行搬上银幕，这部作品让世界永远铭记这段不容篡改的真相。

历史从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需要通过文字、影像与讲述不断唤醒的火种。83年前，舟山渔民的这场义举让“里斯本丸”事件从地方性记忆升华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文明箴言——它深刻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侵害不分国籍”，警醒人类警惕战争，守护人道底线。

由此而言，电影《东极岛》为世界留下的不只是民族记忆的史诗，更昭示了超越国界的人性之光。山川异域，命运相连——这束火炬将穿透历史迷雾，映照当下与未来，化作人类守护和平与良知的永恒信念。（作者系影视制片人）

文艺深一度

在山西大同的青砖灰瓦间解码千年文脉，在东极岛的美景中触摸被遗忘的时光，在阳春古荔枝园、古驿道上品读历史深处的诗意……今年暑期档的多部电影接连引发大众共情，不少观众不再满足于单一的观影过程，而是让银幕故事延伸至脚下，身临其境去探寻历史记忆和文化根脉。

通过电影建立情感连接和背景认知，再到实地去验证和深化这种感受，人们在穿越时空的对话中，自主求取历史和文化的养分。“爬上城墙，从彼时的破碎到今日的繁华，我看到了一座城市的不屈。”“那些弹痕，仿佛在无声诉说着历史。”电影《南京照相馆》上映以来，不少观众来到拍摄地，从他们发布的大量视频中，我们感受到南京老巷里气氛的凝重。当人们走进这片光影与记忆交叠的空间，目的早已不是旅游打卡，而是一次沉浸式的回望。无论是老金躲过的衣柜，还是阿昌工作过的邮局，观众仿佛能够看到片中人物的身影，感受到他们的气息，更感慨于他们在苦难中守护真相的勇气和坚韧。

跟随电影的脚步走进“现场”，打破了银幕与现实之间的隔阂。在好奇心和探索欲的促使下，人们从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最终形成更为深刻、更加持久的立体感知，这一点是导游式的知识灌输无法比拟的。

相比电影的视听特征，现场则叠加了触觉、嗅觉，乃至味觉等多重感官体验，它让历史从故事和知识层面，升华为触及心灵的多维度生命体验。东极岛优美的自然风光与沉重历史的碰撞，带给人们无尽的感悟与省思。与电影院的被动观赏不同，人们可以在开放与互动中，将电影《东极岛》中的镜头代入现实场景，在感受电影情节与真实史料之间张力的同时，用脚步丈量和印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谛，激发对生命、对和平的敬畏。这是电影情节的延续，也是历史的回响。

当一部电影上升为社会议题、文化事件或大众情绪，它便拥有了超越作品本身的影响力，这种“溢出效应”会推动观众通过影视作品与实地探访的结合来获取更丰富的体验，并使两种体验在新的化学反应中相互增益。

站在真实的古迹、遗址和自然景观面前，空间感、氛围感、细节感，以及年代感带给人的震撼，是银幕叙事无法尽传的，因此，找寻与解疑的过程，亦是发现与认同的过程。由于去年《黑神话：悟空》的带动，使山西许多风景名胜具有了世界性的话题传播效果。如今，国风电影《浪浪山小妖怪》以其独特审美和精准共情之力，不仅让不同年龄的受众都能从中找到贴合自身的情感共鸣，也为观众搭建起一座走进传统文化深处的桥梁。

当大同永安寺、善化寺等场景有机参与到叙事中，它们就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坐标，而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磁场。从这个情感入口进去，我们发现，文物古迹与自然风光都变成了活态的文化遗产。“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经过电影的艺术化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在这“一进一出”中悄然发生了。

观众对影片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实现了“题材—情感—地域”三者的有机贯通。让地理坐标成为新的文化磁场，让观众在更多维度上构建对历史和人文的认知，这是近年来国产电影的结构性突破，也应成为更多电影人的文化自觉。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让地理坐标成为新的文化磁场

□张 硕

文艺的跨媒介共生

电视剧《生万物》：

抒写鲁南大地的家国情怀

□戴 清



近期，电视剧《生万物》在央视电视剧频道、爱奇艺“大家剧场”热播。该剧改编自作家赵德发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讲述了一段热血动人的山东故事。《生万物》起笔于1926年，北伐、农会运动、全面抗战等历史事件与背景，有时成为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因，有时则若隐若现，成为鲁南天牛庙村人物活动的远景。剧集的主干叙事与戏剧冲突则是围绕被土匪劫走的大小姐宁绣绣的人生沉浮与情感命运展开，由此演绎出一曲鲁南大地上的缱绻恋歌，其中有农民对土地的痴恋与执着，也融会了那里乡民的家仇国恨，谱写了一曲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刻进骨子里的土地情结与爱恨情仇

《生万物》从绣绣的悲情遭遇展开故事，直接切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革命时期鲁南天牛庙村百姓深受苛捐杂税的压榨，同时还有匪患（剧中称为“马子”）横行摧残的叙事背景。剧中绣绣的哥哥宁可金的地方团练武装与“马子”多次较量，在第20集达到高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期普通百姓的生存艰辛、朝不保夕；其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农会、团结贫苦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租减息，这在剧中有着清晰生动的呈现。穷苦人如铁头带头向宁学祥、费左氏这样的大地主要求佃户永佃，不得随意废止佃户租种地主的权利或随意涨租涨息。此类情节在国产影视剧中多有呈现，有些直接激烈，有些则如该剧表现的，虽有冲

突却偏向温和，同样映射出那一时期剧烈社会变革的丰富折光，展现了近百年前农民的命运沉浮与世态人心变化。

《生万物》中人物形象的定位立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包括爱地如命的吝啬地主宁学祥，作品改变了原作中他的命运走向，温暖细致地呈现了他在世事变迁中的人性转变——土匪再次来犯时，他不再吝惜钱财，但始终牵挂着女儿绣绣，显露了他隐藏的父爱；在抗战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他和村民们、女婿大脚一起烧粮食，这一行为让始终无法原谅父亲的绣绣最终与父亲和解……相形之下，对农户似更温和的费左氏视门楣清白如同生命，她对追求爱情幸福的苏苏的狠厉决绝则是封建思想戕害人性的真实体现。

剧中同样刻画了贫苦农民的人性复杂。如封二有抠门儿与算计的一面，但他对土地以“敬与养”为真谛的农经又渗透着农人的真挚与深情；封四夫妇好吃懒做，吃光耗尽家产，和土匪混在一起，引狼入室、祸害村邻，自己也落得惨死的下场；上梁不正下梁歪，儿子腻味长大后堕落为日伪汉奸，依仗日本人残害乡亲，最终重蹈父亲覆辙；而在绣绣、大脚影响下的弟弟没味则走了正道、能认清是非。费银子为了父母、弟弟、妹妹能活下去，虽然委屈却仍决绝地嫁给年长一辈的宁学祥。宁学祥死后，在绣绣的鼓励下，她开始认真思考人应该“活自己”的道理。

绣绣从无路可走、赌气嫁给封大脚，到二人

先婚后爱、心心相印的过程，构成了全剧最重要的情节线索与情感流脉。剧中绣绣被拐走、被妹替婚这一强情节发展到第12集，随着封大脚与绣绣的真正结合，揭晓了绣绣完璧无瑕的实情，发展到第20集，土匪再次攻打天牛庙村时在全村面前揭晓了绣绣的清白，此情节的改编显露出编剧对绣绣的完美有着近乎执着的坚持。作品更在这一危机变故中让绣绣的家人、亲戚、村民悉数登场，尽显人性本色和内心变化，堪称是一

幅鲁南村民的风俗画与心事图。该剧以优秀小说为基底，经由导演精心把控与演员精湛演技的加持，将跌宕起伏的情节与曲折多变的人物心理情绪错综交织，成就了作品的戏剧张力。

从真实粗粍到光明浪漫

《生万物》和《繁花》《北上》类似，并未对原作28章内容进行完整改编，而是截取新中国成

立前的8章主体内容。剧集淡化了原作阶级斗争与暴力的描写，修改了地主宁学祥的命运结局以及其儿子宁可金的复仇举动，将情节改编为宁学祥向人民政府献出几百亩土地，宁可金成为八路军干部，最终从日本人手中解放了天牛庙村的村民，从而将原小说的真实粗粍风格改编得温暖光明。

《生万物》汇聚众多演技精湛的老戏骨，但从人物形象的光彩来看，主人公绣绣和封大脚这对爱人尤为出彩。绣绣从个人的悲苦中走出、感受土地宽厚而奇妙的力量，带领村民种丹参苗、为村民直面土匪威胁，到在日本人面前不顾生命危险救护可玉以及结尾时做了村里的妇女队长，一步步显示出人物可信可感的精神成长。

从小说到剧集改编，该剧强化了封大脚对绣绣的暗恋，增添了封大脚为绣绣安排八抬大轿绕村三周以及先婚后爱一帘之隔、单挑土匪等情节，让这个人物充满魅力。剧中，封大脚不仅救了绣绣的命，让她重新拥有了温暖的家，更通过两场礼俗给了绣绣最大的尊重与珍视。这里的婚丧礼俗，绝不是热闹的戏剧桥段或为追求影像美感，而是融入了人物的性情，构成了强劲的情节逻辑。

该剧保留了大量原小说中的鲁南民俗元素，如窑台仓民谣、铁牛的传说、农人农经等。创作者对这些元素信手拈来，再通过影像化呈现，进一步突出了鲁南地区的乡土气息与文化底蕴，让作品的年代感、地域性更加质朴鲜明。（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